

情系国宝

刘未鸣 刘剑 主编

国宝沉沦呐喊
魂牵中华大地

纵横精华

故宫国宝的守护者：马衡

曾侯乙 编钟出土面世目击记

圆明园鼠首、兔首终于“回家”

王世襄的书画情缘



文史出版社

纵横精华

刘未鸣 刘剑 主编

情系国宝

国宝沉沦呐喊
魂牵中华大地



中国文史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系国宝 / 刘未鸣, 刘剑主编. — 北京: 中国
文史出版社, 2018. 7

(纵横精华. 第一辑)

ISBN 978 - 7 - 5205 - 0386 - 0

I. ①情… II. ①刘… ②刘… III. ①文物工作—中
国—文集 IV. ①K870.4 - 53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8) 第 138806 号

责任编辑: 孙 裕

出版发行: 中国文史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: 100811

电 话: 010 -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 (发行部)

传 真: 010 - 66192703

印 装: 北京朝阳印刷厂有限责任公司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 × 1092 1/16

印 张: 22.5

字 数: 279 千字

版 次: 2018 年 8 月北京第 1 版

印 次: 2018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

定 价: 66.00 元

文史版图书, 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。

文史版图书, 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。

纵横
精
华

《纵横精华》编辑委员会

主 编：刘未鸣 刘 剑

执行主编：金 硕

编 委：全秋生 孙 裕
李军政 胡福星

目录

-
- 001 故宫国宝的守护者：马衡 / 马文冲
- 014 广集国宝献神州
——记香港文物鉴藏家杨铨先生 / 罗雨霖
- 030 奇人奇功
——王世襄追索收回大批文物的坎坷历程 / 窦忠如
- 042 敦煌国宝历春秋 / 侯国柱口述 景超文整理
- 053 周恩来与流失海外珍贵古籍的回购 / 李致忠
- 057 周总理与“文革”中的文博事业 / 王可
- 066 圆明园鼠首、兔首终于“回家”
——两兽首心酸而富于戏剧性变化的历史命运 / 王开玺
- 072 国家图书馆的四大镇馆之宝 / 金人
- 080 国宝“青铜禁”历险记 / 李腾骧
- 083 西周盛世的吉金——孟鼎 / 冯峰
- 089 天下重器出西周——虢季子白盘 / 冯峰
- 094 再寻失落的古代文书、档案 / 冯子直
- 103 大匠挥斤斧 昂扬出桥栏
——安济桥石栏板 / 梁丰
- 108 《富春山居图》的劫难与传奇 / 窦忠如
- 116 真真假假九龙杯 / 窦忠如

-
- 123 漫话洛阳古玩行 / 吴圭洁
- 137 张大千自画像两次历险记 / 杨方德
- 140 随父亲张大千莫高窟之行 / 张心智
- 154 李济与旧中国的文博考古事业 / 刘作忠
- 162 高山仰止忆朱公 —— 记文物学家朱家潘先生 / 梦棠
- 174 梁思成与“北京保卫战” / 窦忠如
- 187 罗哲文：新中国文物保护事业征程中的“国宝栋梁” / 窦忠如
- 199 郑孝燮三次“上书”保护文物纪实 / 窦忠如
- 205 神奇的擂鼓墩 —— 曾侯乙墓发掘纪实 / 谭维四
- 220 曾侯乙编钟出土面世目击记 / 郭德维
- 234 芳嘉园旧事
—— 纪念“京城第一玩家”王世襄先生 / 窦忠如
- 244 聚散俩松居（一）
—— 王世襄收藏、捐赠明式家具始末 / 窦忠如
- 254 聚散俩松居（二）
—— 王世襄收藏宣德炉的来龙去脉 / 窦忠如
- 262 聚散俩松居（三） —— 王世襄的琴人琴事 / 窦忠如
- 272 聚散俩松居（四） —— 王世襄的书画情缘 / 窦忠如
- 280 聚散俩松居（五） —— 王世襄的佛缘雕刻 / 窦忠如

-
- 289 聚散俩松居（六）——王世襄的漆器世界 / 窦忠如
- 299 徐邦达：一个完全为字画而生的人 / 梅辰
- 309 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治学的四个支点（一）
——古建筑摄影园里的耕耘者 / 窦忠如
- 316 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治学的四个支点（二）
——笔墨春秋成追忆 / 窦忠如
- 324 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治学的四个支点（三）
——诗词记史亦抒怀 / 窦忠如
- 334 古建筑学家罗哲文治学的四个支点（四）
——破解古画中的建筑密码 / 窦忠如
- 343 鉴真坐像回乡记 / 许凤仪

故宫国宝的守护者：马衡

马文冲

先父马衡，字叔平，别号无咎，浙江鄞县人，生于1881年。1955年3月26日在北京逝世。他毕生致力于我国金石学的研究，数十年一直从事历史文物的搜集、整理、保护，自1933年至1952年他一直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，在战火纷飞的年代里，为保护国宝文物，竭尽全力，正如郭沫若先生在先父遗著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一书的序言中写道：“马衡先生同时还是一位有力的文物保护者。中国古代文物，不仅多因他而得到阐明，也多因他而得到保护。”他毕生以保护祖国历史文物为己任，视同自己天职，任何时候，只要得悉某地历史文物被盗或蒙难，他立即不计个人安危得失，挺身而出，一面向社会和当局呼吁，一面亲临现场，奋力挽救。许多历史文物“多因他而得到保护”的事迹，不胜枚举，在此仅录数端荦荦大者以飨读者。

保护古代壁画，免于流落国外

1926年，有山西古董商运抵北京多箱壁画，打算秘密盗卖给外人，

以谋厚利。父亲得悉此讯，以年来国内古物、艺术品被盗运海外者时有发生，国内好古之士欲求一睹之机而不可得，不仅考古家引为憾事，亦为国人之大辱，遂组织人员四出察访，以谋抢先购得而保存之。嗣经人介绍得睹原图，凡 59 方，壁高丈余，长约 10 丈，惜中缺数方，不能恢复旧观。经磋商价购，以 4000 银圆得之。其画虽丈余巨制，而前后照应，一气呵成，可以断定必出自名手，非常工所能为，惜无当时题字，不能确定年代。嗣后按古董商所言，着人前往山西稷山县小宁村兴化寺实地调查，证实乃为大元国戊戌（太宗十年）即宋理宗嘉熙二年所立。因之此壁画之年代得以确定，当为公元 1238 年。原物收归故宫博物院保存。

敦煌壁画一经发现，举世瞩目。昔有美籍瑞典人斯文赫丁，早在清末即曾在我国新疆境内盗掘木简甚伙，乃系两汉时遗物。至 20 世纪 20 年代，又潜入甘肃敦煌盗窃莫高窟壁画。父亲对于外国人盗贼式的劫掠我中华文化遗产，深恶痛绝，绝难容忍。当得悉此讯，立即以北大的名义向社会及北洋政府当局呼吁和检举，并亲自赶往现场，会同当地政府部门，将这一国际文化窃贼驱逐。在当时国力不振的情势下，也只能如此解决。当时发现壁上已有数幅画面被盗，据闻系用先进的科学方法，将整幅幕布用药水浸透，贴附壁画之上，然后将画面与幕布一同揭下，盗回国去，再将幕布贴附壁上，画面即移植壁上。所盗几幅壁画当即查获扣留，幸免遭流落国外之灾。新中国成立初期，父亲曾写过一篇文章，详述此事件之始末，登载于一本宣传爱国主义的小册子上。迄今经 40 年变迁，已无法找到这本资料，只凭模糊的记忆，略述梗概，深感遗憾。

呼吁严办东陵盗宝者

1928年7月，孙殿英东陵掘墓盗宝一案，曾经轰动一时，报章杂志争相连续报道。此案父亲亦是最早举报者之一，时任北大教授，兼任故宫博物院古物馆馆长。孙甫作案，父亲即得琉璃厂古董商之密告，闻之十分愤慨，以清东陵乃历史古迹，应留作史家研究，政府自当保护，岂可任匪徒劫掠，遂会同有关方面向当局举发，呼吁政府对盗卖宝物者严拿究办，追出赃物交有关部门珍重保存，以免散佚。同时，又亲往东陵现场勘查。据闻孙殿英部开进东陵后，声称要搞军事演习，四处设岗放哨，禁止通行。入夜，派工兵营用炸药轰开陵墓14座，其中主要为乾隆、慈禧二陵。开棺时，慈禧面貌一如生前，传说因其口中有一颗明珠故也；见风后，面色发黑，尸骸抽缩，衣服风化，片片碎裂。孙部遂将随葬珍宝劫掠一空。哄传被盗珍宝不计其数，仅钻石、明珠一项，竟重达四五十斤之多。流传尚有翡翠西瓜、蝈蝈白菜，其色泽、条纹与真者无异，蝈蝈振翅欲鸣，栩栩如生，巧夺天工，可称稀世珍宝。

此案轰动中外，全国舆论极为重视。北平当时属山西省主席阎锡山所辖，组织了军事法庭会审，派商震为审判长主持其事，并特请父亲作为考古专家，到庭鉴定赃物并做证。孙殿英看到情势严重，乃多方设法，力求解脱，暗托特务头子，用盗陵的珍宝，到处行贿，直达党国要员。果有奇效，不仅本人逍遥法外，还把已经被捕的要犯师长谭某也保释出来。待到风平浪静，孙将大量珍宝从天津租界出手，大发横财。这批价值连城的珍宝就这样被糟蹋得无影无踪。从此轰动全国的孙殿英东陵盗宝一案，不了了之。

1930年，中原大战开始后，孙殿英虽是举世皆知的盗宝犯，但毕竟还掌握一定武力，阎锡山为了利用孙殿英，欲争取他出任北平卫戍要

职。孙乘机提出条件，要求先通缉故宫马某人，以泄其愤。当时北平的主政者为山西方面的李服膺。他一面答应，一面着人透露信息，通知父亲暂避一时，免遭暗算。孙殿英是靠土匪起家的无赖，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，其所部副师长赵某，即因盗陵案发生后，有不利于孙的言行，当即遭孙暗杀。所以父亲得讯后，不得不郑重对待。那天父亲回到家已是晚上9点半钟，母亲匆匆为他整理随身衣物和行装，在友人陪同下由东交民巷进入前门火车站，乘夜车抵天津，转乘轮船赴上海。逗留南方期间，曾在西湖西泠印社受聘担任一届社长。未几，北方政局变迁，父亲才又回到北平。当父亲由北平出走，抵天津投宿旅馆登记时，为防不测，化名“马无咎”。咎者，罪也，凶也。含义是“虽出走，却无罪过，无凶险。”充满了乐观与信心。嗣后，即以“无咎”作为别号，晚年尝以“无咎老人”署名、落款。这就是“无咎”别号之由来，也留下了为保护祖国文物，不畏强暴，不计个人安危得失的一个纪念。

组织故宫国宝大迁徙

1931年，“九一八”夜，日军偷袭沈阳，数日间山河变色，东北沦陷，翌年上海“一·二八”事变，日军又欲窥我沪滨，随之虎视华北，肆无忌惮地进行着侵占的准备，中日关系已是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之势。1933年，父亲受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，当他受任之际，故宫古物也正面临蒙难之时。鉴于惨痛的历史教训和严峻的政治现实，迫使有关当局作出转移故宫国宝的决定。形势紧迫，刻不容缓。父亲决定把上海作为古物迁徙的第一站，立即组织大量人力，拣选古代艺术珍品，进行清点、登记、装箱。这是一项非常细致而又繁重的工作，点验不仅要登记品名、件数，有些还要记重量、颜色、尺寸、款式、有无损伤等；装箱更须注意安全，以防运输中损毁；尤其要严防忙乱中被盗窃，其责任

异常重大。由于策划、组织工作有条不紊，以及全体职员的努力与负责，清点装箱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。一个夜深人静的晚上，紫禁城的大门缓缓打开，装载木箱的独轮车一辆辆鱼贯而出，任护卫的宪兵和警察伫立道路两旁，夜静如水，只能听到车轮碾在石板路上的隆隆响声，一小时接一小时的过去，手推车川流不息地穿过天安门广场，来到前门火车站。木箱顺序装上两列火车，每节车厢装满后，即被锁住、封死，车皮两头有武装警卫。一切停当，汽笛一声长鸣，火车缓缓驶出北京城，经天津南下，直达上海。在5个月中，共开出6列火车，装载近2万个木箱，木箱里装着24万多件中国古代艺术珍品，其中包括自秦代以来的书法和绘画作品，商代的青铜器和玉器，宋代的瓷器，还有无计其数、价值连城的钻石、明珠、象牙、翡翠、玉雕等稀世珍宝，皆中华古代文化之精粹，中国古代艺术之代表作。

上海的英、法租界，非国宝久停之地，经行政院批准，在南京水西门朝天宫的土山下，建筑故宫分院地下仓库，工程极其宏伟，仅两道铜制密码防盗门即耗资数百万银圆。建成，可防空袭、防盗、防火、防水，仓库内有照明及供氧设备。1936年建成，存放在上海的古物陆续迁入。整理工作尚未及完成，便爆发了卢沟桥事变，继而“八一三”上海烽烟又起，南京也连遭日机轰炸，国宝转移又迫在眉睫，父亲连忙再安排文物西迁，决定分南、北、中三路出发。

1937年8月14日，南路第一批文物乘船离开南京，抵汉口转汽车至长沙，将文物存放湖南大学图书馆的地下室里。父亲随即赶到长沙视察，感到此地甚不安全，决定再找汽车继续向大西南进发。就在他们离开长沙不久，该图书馆即被日机炸弹夷为平地。这批文物西行到达贵州的安顺，找到一个既干燥又通风的山洞，就在那里沉睡，一直到抗战胜利。

11月10日，北路第二批文物乘三列专车，从南京开出，北过长江，经徐州转陇海路，经郑州西抵宝鸡。火车一出南京就遇到日机袭击，幸无损失。翌日，抵郑州时，又遭敌特放火破坏，幸赖车站人员及时将列车从大火中开出。当南京陷落时，专列已安抵宝鸡。日机又跟踪而至，万幸未遭损失。紧接着又传下转移的命令，改乘汽车，翻越秦岭，攀缘唐代大诗人李白当年入蜀的“难于上青天”之古道，向峨眉山进发。从宝鸡到汉中，虽仅百余公里，却行驶了一个多月，沿途屡遭日机追袭，满载文物的汽车队未敢稍息，在蜿蜒崎岖的蜀道上整整盘桓了一年有余。进入四川盆地后，道路越发难行，遇到天雨，一片汪洋，分不出路面、路沟、河道。竟有一次，一辆满载古书的卡车，不慎滑下山坡，直冲向河床，撞到一座桥墩上，司机不幸殉职，古书全部翻入河床，幸河床已干涸，古书无损。经一年多旅途颠簸，最后在峨眉山脚下的一座古庙里，这批文物找到了安全的避难所。

进入12月，上海已被日军攻占，第三批，也是最大一批国宝，尚滞留在南京城中，城里一日数惊，人们争先恐后要逃出城去；长江交通混乱，往来船只十分难找。父亲已在武汉，派职员牛德明务必排除万难，赶回南京，抢运第三批文物。时已是南京沦陷前夕，浦口江面只停有一艘英国轮船。英国船长慑于日军飞机的淫威，拒绝载运。再三与之交涉，许以中方管理人员同船前往，始勉强成行。12月3日，中路第三批文物乘英轮离开南京，驶向汉口。12月10日，日军向南京发动进攻，12日夜南京沦陷。若不是父亲抓紧时机策划督促，以及押运搬迁人员不畏艰险，忠于职守，大批文物就可能落入敌手。这艘英轮驶抵汉口，因形势紧迫，货未下船，继续向重庆进发，中途传来消息，那里连遭日机轰炸，亦不安全。经反复权衡，最后选定乐山为最后目的地。但由于乐山地处岷江中游，英轮到达宜宾就上不去了。这批文物在宜宾等待运输

工具滞留了一年。1939年9月才抵达乐山。在登岸过程中，又发生一个惊险插曲，当装文物的木箱搬上筏子，由纤夫们拉向江岸时，突然一个筏子的纤绳断了，筏子随着汹涌的激流奔腾而下，筏子上的人惊呆了，岸上的人不知所措，在筏子将与大船相撞的千钧一发之际，勇敢的筏工急中生智，突然掉转舵把，使筏子冲上浅滩，才保住文物没有葬身江底。

1939年底，三批文物俱已得到妥善安置。在寻觅选定安全地点中，父亲都亲临现场勘察，反复权衡，才作出最后决定。在那严酷的战时环境中，恶劣的自然条件下，任务艰巨，时间紧迫，交通困难，父亲和故宫的同人们竭尽全力把20余万件文物搬迁存放到安全地带，直到抗战胜利，这20余万件国宝无一受损，无一失落，无一被盗，全部安然返回南京，这不能不说是个奇迹。父亲却从不以此居功，甚至绝少提及。郭沫若先生在《凡将斋金石丛稿》一书的序言中，对此事迹给予充分肯定，写道：“前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大规模侵华战争时期，马先生担任故宫博物院院长之职，故宫所藏古物，即蒙多方将护，运往西南地区保存。即以石鼓^①十具而论，其装运之艰巨是可以想见的。但马先生从不以此自矜功伐。”父亲一生，在金钱和荣誉面前，从来都是这样处之淡然。

为故宫增添稀世国宝郭瓷与杨铜

1944年，抗日战争接近胜利，国民政府教育部在重庆成立一个“清理战时文物损失委员会（简称清损会），次长杭立武是主任委员，

^① 石鼓为秦刻石，我国石刻中最古者，称刻石或碣，唐宋以来多称石鼓。

父亲与梁思成^①、李济^②等任副主任委员。1945年8月日本投降，清损会立即在重庆召开一次会议，确定派往京沪、平津、武汉、广州等地区之工作人员，调查沦陷期间文物损失情况，进行追查索偿和收复工作。派沈兼士^③为清损会平津区代表，王世襄为助理代表，王世襄1941年毕业于北平燕京大学研究院，1943年穿过日军封锁线到达重庆，与先父有世交之谊，由于精通英语，又识文物，为先父罗致故宫工作。

1945年，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，美国纽约大都会美术馆副馆长翟荫来到重庆，受联合国文物保护组织委托，来华观察调查战后中国的文物损失及保护情况。他提出希望能到成都、西安、北平三地观察后返美。王世襄自然是陪同译员的最佳人选。父亲对于外国人，警惕性甚高，特地叮嘱王世襄：“对翟荫必须密切注意，防范他借观察、调查之名，进行盗窃、搜购文物，如有此等事情发生，应立即阻止，并报告清损会”。一路上，王对翟荫谨慎戒备，形影不离。

动身前，父亲特地对王世襄介绍了北平“郭瓷”的情况，“郭瓷”系指郭葆昌所收藏的瓷器。郭葆昌，字世五，号觥斋，西城羊市大街古玩铺学徒出身，精明干练，为袁世凯赏识，委赴景德镇烧制洪宪瓷。他对瓷器鉴定有一定实际经验，喜藏书画、古瓷，编有藏瓷图谱《觥斋瓷乘》20册。故宫古物南迁之前，他受聘该院瓷器、书画审查委员。约于1935年前后逝世，藏瓷为其子女郭昭俊等数人所有。父亲对这批文物素有了解，一向十分关心，所以在王世襄去北平之前，特地向他交代：“郭瓷是一批重要文物，其中有些是稀世精品，清官窑仿古‘彩牺耳尊’连故宫都没有，你到北平后要注意这批瓷器，向郭家的人恳切地

① 梁思成，时为研究古代建筑的中国营造学社社长。

② 李济，时为中央博物院筹备处主任。

③ 沈兼士，教育部特派员，曾任故宫博物院文献馆馆长。

谈一谈，最好不要让它散掉，将来完整地归公家收藏才好。”但是具体如何归公，父亲没有说，因为这不是敌产，除收购别无他法，而收购需要一笔巨款，父亲心里明白，当时请专款收购古物，不仅不会批准，也许还会遭到物议。故仅示原则，并无具体措施，全看受托者见机而行了。王受此重托，抵平就先找到郭昭俊，郭谓：“其家瓷器虽已分成几股，但并未散失，也未出售，若公家收购乃求之不得。”唯因牵涉价购问题，一时无法开展。这时王世襄想起一位前辈朱启铃，号桂辛，两家夙有交往。民国初年，朱老曾任交通总长、内务总长，虽供职政界，但对祖国文化十分重视，素有提倡建树之功，曾筹划成立我国最早的艺术博物馆古物陈列所，也曾出资创办研究古建筑的唯一机构——中国营造学社。他对古代文化的许多学科也多有贡献，受到中外人士推崇。并与当时国民党上层官员颇多交往，因而王世襄想到应去向这位前辈请教如何进行，或能找到解决途径。果然得到朱老的关注和兴趣，也恰好当日下午适逢行政院长宋子文约会来访，朱启铃当即将这批瓷器的价购问题面陈，委托宋给解决，宋当即表示同意。几经努力，多方周旋，1946年7月，郭昭俊到故宫面称，全部藏瓷已由政府收购，请故宫择日去郭家验收，经过4天逐件核对点验后，运回故宫列为国宝，存入延禧宫库房。据闻宋子文收购郭瓷付给了10万美元巨款，名义算为捐献，并给郭昭俊在中央银行安插一个工作。此事牵涉重金价购，据当时情况，很难指望能如此顺利解决，当然这与王世襄对工作的认真执着分不开，也体现了父亲知人善任的特点。

另一件，关于没收德商杨宁史青铜器240余件免遭流落海外之灾。抗战时期，平津两地文物流失极为严重，除侵略者盗窃损毁外，还有外国商人趁火打劫，低价抢购，伺机外运。这也是父亲一贯重视的问题。行前特别叮嘱王世襄抵北平后，务必注意察访这方面的情况。王世襄一

到北平先走访几家古玩商，又在中山公园设宴招待知名的古玩商四五十人。请他们提供线索，声明有功者给予物质奖励，并消除其顾虑。有三家古玩商提供了一条重要情报：沦陷时期，河南出土一大批青铜器，被德国禅臣洋行经理德人杨宁史买去，准备运回德国。王世襄立即只身前往干面胡同禅臣洋行察看，时办公室内只有一位外籍女秘书在打字，王世襄在等待接见中凑上前去察看，由于他精通英文，一眼便看出正是一份青铜器目录，便立即上前把它拿到手中，同时亮明自己身份，询问缘由。女秘书说，目录是一位美籍德人罗约^①交给她打的，若需用这份目录，请找罗约索取。当罗约看到目录已在王世襄手中，只得承认目录是自己编的，但器物却是杨宁史所有。此时，杨正在天津，王世襄为防万一，立即持目录，带上罗约，直奔天津，会同当地敌伪产业处理部门，找到杨宁史对质。杨在人证、物证面前不得不承认有这批铜器，但仍不甘心交出，编排谎言，制造假象，意图搪塞，伺机外运。为收复这批青铜器，王世襄三赴天津，烦请其前辈朱老启钤，会同国民党高级官员，宋子文院长，敌伪产业处理局长孙越崎、钱昌照等，协同处理此事。谈判结果，杨把所藏青铜器全部交出，不叫没收，算他捐献给故宫博物院，我方同意他的请求，准许两个德人罗约和女秘书康斯顿^②继续到故宫完成其尚在编写的图录。1946年1月22日，故宫派员将这批青铜器运回，直运御花园绛雪轩，在各界代表监督下，逐件清点、造册、验收，共240余件，送存延禧宫库房。这批精品中，首推宴乐渔猎纹铜壶。壶高31.6厘米，腹径21.5厘米，铜壶缩口、斜肩、鼓腹，肩上有两只兽首衔环。乃战国时期魏国所造，制作技艺精湛。最为珍贵之处在

① 罗约，美籍德人，曾任哈佛大学福格美术馆馆长，对中国画、青铜器、古玉等有专著。

② 康斯顿，曾写过有关中国美术、园林、青铜器等文章。